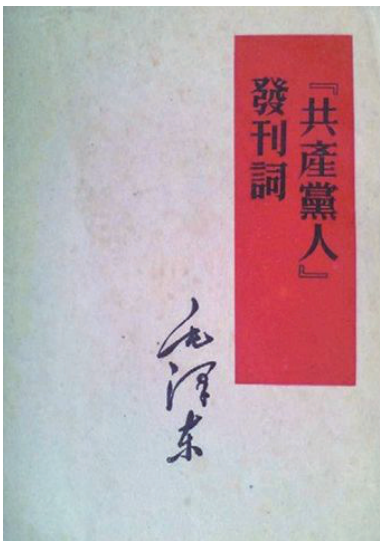




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重温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 徐春辉



推进党的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是由党所处的党内外、国内外环境决定的。“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毛泽东强调，党内大批的新党员和新组织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部分老党员和老组织还有待于提高水平，有待于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同时，外部环境上，帝国主义在我后方以政治进攻为主，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已经成为当时时局中的最大危险。为了更好地解决党的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新挑战，迫切需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推进党的建设这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是由党所肩负的任务决定的。“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我们党肩负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进行残酷战争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强调，为了完成党所肩负的这个艰巨任务，共产党人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全力动员群众克服党的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危险，并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以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会因此“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在党的整个建设发展过程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正确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这是全党都不能忘

记的“血的经验”。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毛泽东强调：“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党内政治路线正确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会后退一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也就会后退一步，“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在党的十八年历史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在这些伟大斗争中，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和巩固自己，从“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逐步发展、巩固为“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党。党的十八年发展历程证明，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

党的建设过程，“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

毛泽东强调，要完成革命的任务，达成革命的目的，需要“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

党的建设需要“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需要“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需要“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毛泽东指出，在党的幼年时期，“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党员“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内涌现出的活动分子“没有来得及成长为党的中坚骨干”，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没有坚定起来。而在土地革命战争阶段，由于我们的党员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取得了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毛泽东强调，我们相信，“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革命的任务一定可以完成，革命的目的也一定可以达成。



韩愈的“四美”治学之道

□ 王晓兵

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可谓无所不读。

多读书需要有刻苦勤奋的精神。韩愈三岁而孤，虽贫困困顿却有读书经世之志。幼时即嗜学，七岁苦读诗书，“日记数千百言”，及长，尽通《六经》、百家学。韩愈读书勤勉不怠，夜以继日。曾自称：“余少之时，将求多能，早夜以孜孜。”“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门弟子皇甫湜在《韩文公墓志铭并序》中云：“（韩愈）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食以饱口。”韩愈读书之勤奋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书卷不离手，疲倦了用书当枕头，吃饭时用书当菜下饭，终成“茹古涵今，无有端涯”的饱学之士。

韩愈不仅身体力行，还告诫弟子后人要勤奋读书。他在《进学解》中首提“业精于勤，荒于嬉”，劝勉弟子学业的精深在于奋发努力，勤勉进取，嬉戏游乐必然荒废学业。在诗作《符读书城南》中，韩愈劝告其子韩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经。读书

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如若慵懒怠惰，随波逐流，终将一事无成。

潜 思

“思义患不明”，韩愈认为博学多闻之后要潜思，读书经过潜思考，才能义理通达，领会所学知识要义。而运用“提要钩玄”法可以引导深入思考，以掌握精要、通晓义理。

古来圣贤未有不深思者，读书若不思考，则只是相当于识得外表一个皮壳子，未真正识得里面的精髓。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韩愈在《进学解》中指出：“行成于思，毁于随。”读书治学需要深思熟虑，潜心钻研，才能真正理解所学知识精髓。韩愈强调要“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古代典籍往往义理深邃、寓意深远，不潜心思，咀嚼品味，则无法真正领悟其中要言精义。

如何深思以通晓义理？韩愈提出“记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后人将其概括为“提要钩玄”读书法。而具备“提要钩玄”之功，绝

非一蹴而就者，需要在长期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结合深入思考，方能练就。边读书边思考边做好札记，记其精英根源，则根本大意才能了然于胸。“必提其要”，抓住纲领，才能纲举目张，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玄”，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深入思索，考究同异，剖断是非，并自记所疑，才能真正入脑入心。

虚 心

“患足已不学”，韩愈主张治学要虚心，要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不能骄傲自满，不思进取。做到虚心还要从师而学，并择善而从，才能不断进步。

“自知者自明”，人贵有自知之明。韩愈在《答侯继书》中云：“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虽今之仕进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仆虽庸愚，每读书，辄用自愧，今幸不为时所用，无朝夕役役之劳，将试学焉。”他虽广学博闻，百家之书，几乎无所不通，仍

然非常虚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认为“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仍将自强不息，昼夜不倦。

虚心，除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外，韩愈还主张学必从师，批判“耻学于师”的陋习。韩愈指出，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一般人很远，尚且虚心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不但不谦虚学习，反而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如此，怎能治学？至于择师的原则，韩愈认为“圣人无常师”，择善而从。他在《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岍相公书》文中言：“昔者齐君行而失道，管子请释老马随之。樊迟请学稼，孔子使问之老农。”老马识途，老农知稼穡，各有所专，因此皆可师。

笃 行

“既学患不行”，韩愈主张要笃行，这是治学的目的，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1939年10月，为动员群众克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危险和准备对付可能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出版了一个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系统分析了《共产党人》的任务及其出版的必要性，并详细阐述了“怎样建设我们的党”的十八年斗争经验。这篇文献既是中国共产党斗争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

毛泽东指出，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也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所在。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百代文宗”之誉。他还是杰出的教育家，“奋不顾流俗”“抗颜而为师”，广收门徒，提携后进，曾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子监博士、国子监祭酒，在教书育人方面卓有成就。韩愈在自身长期的学习和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到的读书治学思想。他在劝学诗《赠别元九十八协律六首·其五》中称赞侄管观察史裴行立：“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实大华亦荣。”在此诗中，韩愈概括提出了“四患”和与之相对的“四美”治学之道，读书患不广博，故应“多读”；领会要义，患悟得不透彻，故应“潜思”；患骄傲自满停止学习，故应“虚心”；学习之后患不付诸实践，故应“笃行”。韩愈提出的多读、潜思、虚心、笃行这“四美”读书治学之道，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多 读

“读书患不多”，韩愈认为读书治学首要是多读，学业的精深要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要在广博的书山、学海中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则唯有勤奋。

韩愈提倡读书要“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学问无巨细，皆力求所获不弃，务求尽多的获得知识。他广泛涉猎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在《答侯继书》中自称：“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

《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9期目录

【名家观点】
本刊编辑部 中美贸易争端：一场难以结束的发展较量
—— 访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
本刊记者陈偶 全球危机与中国的乡村振兴
—— 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丁元竹 新中国70年社会沟通方式变迁与展望
宋世明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70年回顾与反思
杨英杰 郭光敏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经验理论研讨述评
旬华 中国公务员录用

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变革趋势

【机构改革】
宋林霖 陈志超 深化地方市场监管机构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袁维海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创新

【调查与思考】
张 壮 赵红艳 中国国有林区管理体制的重构
—— 基于黑龙江省伊春国有林区的个案研究

【比较与研究】
赵祖平 法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及其变革
—— 全球化及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探究



韩愈重视实践，提倡学以致用，务实学风。他在《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言：“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行且不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讲究排偶、音律、辞藻的浮艳和颓靡文风，提倡“言之有物”“文从字顺”“辞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强调学习先秦、两汉的文章，主张“文以明道”，学以致用。他躬行实践，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排斥佛老，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宗旨，着意于“道”之用，创作出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众体兼长、不落俗套的散文作品。期望通过“古文运动”，复兴“儒学”，通过儒家学说凝聚人心、重塑人心、再造灵魂。被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还践行经世致用的务实政风。他崇尚儒家文化，希望学有所为，行道利世，报效国家。韩愈为官务实，即便被贬至边远的地方为官，他仍然践行君臣之义、亲民之策，践履笃行，以实际行动鼓励后学要勤于实践，知行合一。韩愈曾因谏迎佛骨事由刑部侍郎被贬为潮州刺史，虽在潮州只有八个多月，但做了大量勤政为民的好事，如启动教育改革、开办学校“教化民众”、兴修水利、释放奴婢、发展农业、奖励农桑等。

